

中國「大西部開發」背後的社會危機*

姚蘊慧**

摘要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西部大開發的決策，目前許多大型的公共工程與交通建設，在政府主導下，構築出美麗的硬體輪廓。然而，在華麗的文辭建構與硬體外衣下，隱藏的仍是極難處理的方向抉擇。如果良好的經濟發展是需要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為基礎，那麼大西部開發目前究竟建築在何種社會環境之上？本文就社會中的不平衡與不平等（所得分配的惡化、階層發展與衝突）、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社會穩定與社會整合狀況（社會發展與價值認同、族群衝突與族群發展）、全球化的影響等面向對大西部社會結構做一統整性之觀察，研究發現當前之社會結構的危機對大西部經濟發展是嚴重的負向拉扯，中共必須及早對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整合做出更好的方向抉擇。

關鍵詞：西部大開發、社會發展

*本文承蒙二位審查人細心指正，在此致謝。又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2006/10/02 國父紀念館主辦之「實業計劃與中西部開發」學術研討會。

**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The Social Crisis behind The West China Region Development

Yao, Yun-Hui

Abstract

The CCP made a decision to strongly develop west China several years ago .A lot of huge public hardware structures had been build up, policies had been made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growth, too. But behind the economic part, does the social structure good enough to afford a stable basis i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ry to check several social structure in west China region: resource distribu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peasant's problem,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issues. And find out that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west China is in cri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policy- makers in China should realize the dilemmas in their developing way, and try to seek another way that could solve the problems bot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west China region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中國「大西部開發」背後的社會議題

姚蘊慧

一、 前言：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東西部區域發展始終呈現失衡的狀態，城市和鄉村也有明顯的差距。與沿海地區相比，大陸中西部雖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與潛在的人口與市場，但同時存在著資金短缺、技術落後、觀念陳舊、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等諸多問題。(田秋生，2002：171)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西部大開發的決策，一方面是希望平衡東西區域差距、在合作中協調發展，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西部已然必須擴大對國際開放以成爲全球經濟的一環。

後發展的區域，雖然有其「後發優勢」(楊小凱，2000)，可以一步到位，並減少試誤過程。然而大西部開發，仍然有其極爲複雜的內涵。首先，必須儘速將以農牧礦業爲主的面貌開始部分轉向工商發展。然而『三農問題』等許多結構性問題尚未解決，是經濟發展的極大隱憂。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如何引進東部資源或外資，顯然亦成爲各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務。再者，在發展方向上，無論是接續東部西移之勞力密集產業，亦或直接開發高新科技，技術的引入與人才的培訓又成了開發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如何引進人才、培育人才顯然也是各地方政府積極進行的工作。目前許多大型的公共工程與交通建設，在政府主導下，構築出美麗的硬體輪廓，今年七月一日，青藏鐵路通車，樹立了西部開發重要的里程碑。然而，在華麗的文辭建構與硬體外衣下，隱藏的仍是極難處理的方向抉擇。

如果良好的經濟發展是需要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爲基礎，那麼大西部開發目前究竟建築在何種社會環境之上？穩定嗎？和諧嗎？當前之社會結構對經濟發展是正向的助益或負向的拉扯？本文企圖在大西部硬體經濟建設之外，找出軟體的社會結構面貌與影響發展的社會議題。並嘗試對這些議題提出方向指引。

二、 不平衡與不平等的社會

改革開放後所實行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有其必然和合理性，也帶來了正面的效果，刺激，帶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同時，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也自然會因勞動者才華的差異，機會和勞動成效而出現其收入上的差別。而各個地區的不同發展狀況，自然資源狀況，各個行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據的不同位勢，市場需求狀況都自然影響到各個階層的不同收入。這屬正常健康之列。問題是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權力對市場的非正常介入帶來少部分人不正常，非法的高額收入的同時是仍有相當數量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尚未脫貧和因失業下崗，疾病退休等原因出現新的城市貧困群體。

中國社會正面臨空前結構變化，舊的體制有的已經或正在崩解，新的社會階層和結構正在生成。這一方面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然；另一方面，也爲這轉型期帶

來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原先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形成一個平等而無階級的社會，但改革開放後，中國卻呈現愈來愈不平等的面貌。如何在改革中維護社會正義，減少社會貧富差別加大所帶來的問題，這成了許多關心中國改革前景、社會變遷的中外學者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這不僅是一種道德的關懷，也因此問題直接關聯到中國的穩定和發展。

1 所得分配的惡化

大西部有著全中國最窮困的區域，農牧人口佔大多數、但因為資源匱乏工作有限，許多人成為沿海省分的低階勞工。喊了五年的西部大開發，至今人民實際的 GDP 並未增進，接近 30% 的人口，2005 年 GDP 只佔全國 16.9%（詳見表一）。

表一：2001-2005 年西部地區 12 省 GDP

西部地區指標	佔全國的百分比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GDP	17.1	19.2	16.9	19.8	16.9
人口	28.7	28.6	28.8	28.7	28.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02—2006 年。

人民生活是否真實地漸入佳境，才是西部大開發成功的指標。毫無疑問，社會貧富差距的急劇加大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依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6 年出版的《社會藍皮書》，2005 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率為 6%，如果 2005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度實際增長率為 9%，那麼按照農民人均純收入衡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由 2004 年的 3.2 倍擴大到 2005 年的 3.3 倍左右（顧嚴、楊宜勇，2006：277）。

不同區域之間 1980 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 191.3 元，東，中，西部地區農民純收入比是 1.39：1.11：1。而 1995 年同樣的數據已為 1578 元，東、中、西部之比則為 2.30：1.30：1。2004 年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最高省與最低省之比達到 2.31 倍，05 年達到 2.36 倍；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最高省與最低省之比同樣數據為 04 年 4.1 倍，而 2005 年竟然就達近 8 倍（顧嚴、楊宜勇，2006：278）。

中國家庭收入五等分比中，1996 年到 1997 年城鄉居民各組占總收入的比例分別為 1.06%，8.63%，14.14%，21.77% 和 51.40%，從此時起前 20% 富裕家庭的收入已超過了其它 80% 家庭收入的總和。如果以這種比例來看，中國的貧富差別已經超過美國。2005 年，城鎮居民家庭收入五等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之間的收入估計相差 6 倍，同樣數據在農村為 7 倍（顧嚴、楊宜勇，2006：278）。基尼系數 2004 年達到 0.53，是 1984 年 0.23 的兩倍（朱慶芳，2006：376）。除這種一般性描述外，任何人都可以從經驗直觀的角度觀察到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收入差距拉大過快及貧富兩大階層收入差距過於懸殊，並造成兩極化現象，已成為當前階層分化過程中最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還記得僅僅二十多年前中國還以其嚴格的平均主義著稱，而今天其貧富差別程度甚至超過許多發達國家，我們便不能不對這種社會兩極分化的速度感到震驚。也不難體會大西部人民為何有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2 階層發展與衝突

隨著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擴展，社會的衝突和矛盾有急速加劇的趨向。在急劇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常常出現某些群體相對剝奪感加大的現象，如果在缺乏制度和信息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這往往會成爲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社會各階層間因缺少必要的溝通管道，相互的漠視、猜忌，敵意正日漸加深，這種現象尤其表現在新富階層與貧困階層間。這在一個長期以階級鬥爭爲國家哲學的社會，在對社會衝突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缺乏正面認識的社會，這種敵視和猜忌自然加深了社會矛盾，強化了社會緊張。同時，由於各個階層在社會系統中占據的位置優勢不同，動員國家權力的能力不同，也導致各階層之間的衝突常常折射到各階層與國家的衝突上去，由此埋下爆發政治危機的巨大隱患。

若就其社會聲望，權勢與財富的狀況，來探討中國社會結構的上中下層及其互動狀況，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陸學藝，2002）。在最近十來年的改革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上層精英階層，這個精英階層主要由幹部階層的上層和企業家階層的上層，包括知識分子階層中與這兩類人保持著一種密切關係的某些人組成，對政策的走向影響重大。這些人之間所占有的財富，權勢和享有的社會聲望也有不同，但整體講佔據了社會總體資源相當大的部分且其占有份額的比例有繼續擴大的趨勢。中間階層的上層包括高級知識分子，中小型國有和私人企業經理，業主，外資白領雇員，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等，下層由一般科研人員，技術人員，普通文藝工作者，大中學教師，新聞從業者，機關幹部，國有及集體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個體戶等構成。而由工人和農民階層包括社會邊緣階層的大部分組成了一個社會底層。依據這樣一種分類，在一篇引起廣泛迴響的有關中國社會結構轉變的文章中，何清漣指出中國已經出現一個兩極分化，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占1%人口的社會上層，中間階層約占15.4%，而占67%的社會下等階層和約占14%左右的邊緣化的社會群體構成社會的基礎。這樣的社會因少數社會精英的地位和財富無法得到占人口大多數的社會成員的承認，因此社會具有高度的風險性，缺乏穩定性。若以西部民族區來進行研究，其階層結構爲占0.29%人口的社會上層，中間階層約占14%，而占85%以上的社會下等階層和邊緣化的社會群體（陸學藝，2002）。金字塔圖像更爲鮮明。各階層之間不僅缺乏良性互動和相互理解，社會流動亦不易。這種狀況對今後中國社會的穩定轉型自然有許多不利的影響。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講，中產階層的成長對中國的社會的穩定與轉型成功至關重要。但令人擔憂的現實是，由於現有體制的局限，這個中間階層的軟弱可能使該階層的一部分人努力與上層階層的某些人結盟，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上層社會而反過來壟斷資源，造成社會的下等階層向上發展和其他中等階層維持其狀況的困難，由此導致中間階層的分化萎縮，最終影響社會合理穩定的結構的建立。對於大西部區域來說，由於中層人數更顯稀少，問題將更嚴重。

三、 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大部份的農民都面臨以下困境：普遍貧窮無法付擔生活所需、農產量（因技術與能力欠缺）已無法提昇、平均可耕地面積過小、水土環境欠佳、想轉業又受農戶籍身份限制、還需面對農村基層幹部的腐敗欺壓、稅賦過重、社會保障欠缺、土地不當徵收、農工外流卻被欺壓欠款、入 WTO 後農業前景更堪憂慮。之所以稱之為「三農」問題而不是農業問題，是因為大陸的生產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動，多數農村人口只能以農為生，即使進城打工也依然受到原籍鄉村管理的種種限制，整個農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於城市系統的體系。在此之上則是靠農村繳納的稅費養活的縣、鄉兩級多達一千五百萬的基層官員，這兩級政府對農村的農、工、商諸業擁有全方位的控制力。這樣，農業、農民的非農就業、農民的稅費負擔等問題，最後都表現為農村政經體制對農村社會經濟整體發展的束縛。其中涉及到的許多制度問題不是單純的經濟改革所能解決的，還涉及到農村的政治制度。是故大陸農村問題學者將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歸結為「三農」問題。

雖然過去十幾年來，每年中央政府都下達一些要求減輕農民負擔的指示，但從來不考慮如何消除農民不合理負擔的根源——鄉村基層政府規模過大、開支過多，早已超出了正常稅收所能負擔的界限。而基層政府部門深知中央政府對基層亂攤派的姑息態度，所以不但敢於截留中央有關減少攤派的指示，甚至公然違反中央政府的要求，向農民徵收稅費時搞黑箱作業，自立專案、加大標準亂收費，結果導致農民建不起房、結不起婚、讀不起書。村民們因利益一再受到基層幹部們的侵害，積聚的怨氣越來越大，對鄉鎮幹部們從不滿到不信任、不合作，直至對鄉級政府產生嚴重的抵觸情緒。（鄭欣，2003）

大陸中央政府曾在上個世紀末開始在農村推行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的稅費改革，由於減少鄉鎮政府人員和開支一事阻力太大，所以大陸的中央和省級財政曾增加對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數額，但在農村基層政府數額龐大的財政缺口面前，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只不過是杯水車薪。據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區丹洲鄉的官員介紹，在他所在的這個鄉，國家財政增撥的款項連支付鄉政府的債務利息都不夠。事實上，試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各地區農民負擔的相繼回升表明，稅費改革常陷入了「黃宗義定律」的怪圈。（章榮君，2005）佔中國人口七成以上的農村前景不佳，勢必構成對大陸經濟總體發展的約束。而大西部農業人口又遠超過其他區域，農業收入卻又低於其他區域，在資源相對不足，政府補助又少的情況下，「三農」問題顯然較其他區域更為嚴重。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開展，解決這個現代化過程中的陳年積痛，今後仍然是大西部發展的基本難題。

四、 社會穩定與社會整合

中國當前社會穩定和社會整合問題也面臨嚴重的挑戰。

1 社會發展與價值認同

前文所述及，隨著舊體制的解體，社會分化的加深和社會各階層以及社會成員間利益差別加大。原來的社會結構逐步被打破，階層界限和角色身份系統變得模糊，先賦身份被靈活的職業身份所慢慢替代，收入、權力和職業聲望彼此間錯位，出現了政治評價系統、利益評價系統與社會文化評價系統並存的格局。官方在此方面的宣傳搖擺於一種過時的意識形態標準和一種現實主義的標準之間。對財富的崇拜和對社會正義的要求常常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自相矛盾。舊體制解體的同時新體制尚未建立，遺存的舊的規範和制度與新的現實之間脫節，而新的現實又缺乏新的制度和規範的制約和支持。

新舊身份系統交錯和收入差別引發人們的社會心理的不平衡，不同群體間摩擦衝突增大，階層行業單位間的對立情緒開始為頭，貧富矛盾因分配不公得到激化，誘發越軌行為大增，不安定因素持續增長，社會失序的狀況日漸嚴重。常見的腐敗現象會消解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引發文化價值系統方面的危機。而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削弱和文化價值系統的危機反而會使腐敗現象得到進一步的擴展甚至取得某種現實合法性。社會整合能力急劇下降，社會穩定警訊不斷。這就是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局面。

一方面，過去支撐社會運作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意識形態正逐一解體，其社會整合功能大幅削弱；另一方面，維繫社會紐帶的許多傳統要素剛得到解放就立刻面臨商業大潮和現代西方文化的衝擊，也不能有效地扮演社會整合的角色。從整體看，社會尚缺乏足夠有效的社會自主力量以利於社會的自我重建與整合。前二十年，改革的重心基本上在體制外，體制內的階層分化相對落後，國家的管理和各種組織的轉變無法有效地應付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弱化，亦代表其作為正常的社會管理控制機制和權威的角色被弱化。於是政府亦逐漸失去對維繫社會的正常運作和穩定，及保證社會的發展負責的能力。這些年不斷急劇增長的社會衝突事件¹（2004年15人以上的集體衝突案件共有74,000起，2005年就達到83,000起），凸現着這個問題的急迫性嚴重性。另外，社會犯罪問題的惡化也突出地凸現了這種社會整合的危機，社會價值的混亂，貧困和社會不公正為犯罪提供了動機，國家權威的淪喪和社會控制制度的不健全，也是造成社會犯罪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²。

若社會無法有效統整，經濟發展必須付出極大的社會成本作代價。但應如何整合？光靠官方宣傳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的道德思路，效果值得存疑。若設想只要市場經濟能得到發展，經濟的力量自動會創造一個和諧的正常的社會秩序，証諸歐美經驗，這也不符實際。中國實在必須重新檢討二十多年來改革的道路與實踐，重新確定以社會正義和經濟發展相平衡的原則，以民主、法制和現代的文化意識作為重建社會整合、維繫穩定的基礎，才能發展一個健全的現代公民社會，以做為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礎。

¹ 新華社，2006年1月9日。

² 宗勝利、李國忠，2006：144-153

隨着各種社會問題的逐一暴露、社會危機的加深，當局也日漸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十一五規劃中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的治國方針，政策上也做出相應調整如不再以經濟得增長作為絕對的目標等等，不過這種政策的調整若不伴隨制度上的改革，效果如何實有待觀察。

2 族群衝突與族群發展

就中共的理論而言，民族是一個歷史範疇，民族問題是一種社會現象。民族問題與民族的存在相伴生，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別存在，就有民族問題存在。大西部區域，恰巧是民族最為複雜的區域，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也有不同的民族認同。對中共當局而言，對這些差異，是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視它們的存在，也不能用強制的方式加以改變；對各民族在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應積極創造條件，努力縮小和消除。

然而，中國大陸的民族問題往往表現為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現實問題與歷史問題交織在一起，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交織在一起。大西部的民族區域，由於地理條件限制、發展基礎薄弱、市場開發條件差、自身發展能力弱等原因，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著許多的困難和問題，與沿海發達地區相比，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2004年，民族自治區域人均生產總值只有全國平均數的67.4%，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數的71.4%。³中共當局這些年來對「西部大開發」及「和諧社會」的強調，也與族群議題有極大的關係。

五、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部開發

2001年11月，中國大陸加入WTO，意謂著中國大陸面對全球化趨勢，將更大範圍的對外開放，亦將更深度的參與國際經濟分工與合作。入世後，中國大陸將面臨許多發展機遇，同時也將有新的挑戰等待克服。有利的發展機遇包括：加速產業升級與經濟成長、提高市場化進程、擴大就業規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吸引外資並帶入技術與管理經驗、開拓國際市場...等。然而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競爭與全球風險，將對低度開發的區域（如大西部）與產業（如農業與低階工業）帶來強烈的衝擊。

德國社會學者 Ulrich Beck 指出，「全球性意謂：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世界社會中，而且這表示，對封閉空間的想像已經是脫離現實的。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群體可以自我隔絕。」（孫治本譯，1999：14）面對全球化，研究發展的「依賴理論」的學者卻告訴我們，低度發展的區域，最好能閉關自守，自立自強，獨立發展，以免被先發展區域宰制，反而造成經濟成長停滯。甚至，嚴重的還包括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官商勾結、社會動盪不安.....等「低度發展」

（underdevelopment）現象（Frank, 1967/1969；Baran, 1973/1957；Dos Santos, 1970；

³ 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05/05/27），新華網北京電。

Amin,1974)。

大西部開發至今，並未與中國其他區域隔絕，亦相當歡迎外資，選擇全球化，其實預表了開放以及邁向全球競爭。在全球經濟中，競爭的贏家通常可以搶到極多的資源，只是競爭是不講平等的，在可見的未來，大西部將以孩童之姿與經濟巨人較量，必須有更多的戰略與後盾才能支稱下去。然而中國的地方財政分配多寡，往往與其發展程度成正比，讓大西部區更陷於發展的弱勢。

如果全球化指的是政府解除強加在國家間交流之上的種種限制，從而創造出一個開放的、無國界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它想強調的就是擺脫國家保護管制，進入全球的自由競爭。然而競爭的優勢者將得到逐漸集中而豐厚的資源，與弱勢者間的差距亦將日益加大，在國家逐漸失去保護弱勢者的能力與興趣後，全球化之後的社會，弱勢者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全球化的競爭，爲了得到更大的優勢，許多國家會採行減稅、縮減社會保障與勞工權益⁴、犧牲低階或無效率的產業、迎合資本家與跨國企業。擔負健康保險、合理薪資、就業機會等等責任，已經由國家與雇主轉換到個別勞工或家庭身上。弱勢家庭亦因此增多。這使原本期待開發與現代化後得享雨露均沾效益的人民大失所望。事實上全球化將使目前貧富差距的鴻溝更加擴大，階級金字塔圖像更加鮮明。由競爭的角度而言，全球化無法消滅貧窮，卻會讓更多人跌落貧窮線。

全球化常意味著全球人口快速移動，在此情況下，勞動力的移動常跨越各民族國家原先所劃下的界線。勞動力的國際移動將對國際勞動力市場產生深遠的影響，其影響層面可能是高科技與跨國企業所需的高級人力，或是低階層低技術勞動力的移動。而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移動，也明顯影響著中國社會。人口的移動造成新的社會問題，包括認同與接納、偏見與歧視、新的社會階層排序，不僅是經濟上的議題，也對社會政策產生影響。

在全球化趨勢下，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相像；但同時我們也開始認知、理解到我們之間的差異。在全球趨同的同時，地方卻在無疆界的時代再度興起，全球化與地方化同時發生，這是所謂的「全球地方化」(glocal)概念，一種「思維全球化、行動地方化」(Think Global, Act Local)的回應。是一種同中求異的自我認同概念，與全球化之間產生了辯證的發展關係。

任何國家或社會都有其與他國不同、獨特和重要的元素，關係著該國的發展和文化的綿延。一方面可與他人區隔，一方面營造認同與及共同體意識。在全球化過程中，此種差異的意識將不斷被增強，亦即所謂本土化或在地化作用。強調母語、強調在地文化認同、強調我族 (we group) 意識、抗拒強勢文化之同化作用、強調多元尊重與包容...等，皆爲本土化之重要觀點。大西部在此認知下，是否能避免全盤西化，積極進行包括母語、少數民族語言的恢復、地方文化的恢復或重建，都將是重要改革方向，產業的發展必須在全球化架構下依據地方特有脈絡來規畫

⁴ 國家原本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保護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作法包括設定安全標準、規定最低薪資、禁止童工、加強勞工在薪資談判中的地位、工時的規定等。上述保護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下更形重要，因爲相較於資本而言，勞動的國際移動能力是相對低的。

才有成功的可能。

六、 結論：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整合

中國經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舊體制所確定的社會分層體系逐漸崩解，社會流動的加速，價值系統的混亂和國家制度轉換的不利等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社會整合上的困難，導致社會穩定面臨空前的挑戰。面對大西部開發的各項社會議題，似乎樣樣都是艱困而難解的，盤根錯節，無法動彈。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方向的拿捏。自由或平等？市場或規劃？競爭或保障？

自由市場競爭的道路，的確難以避開社會問題，也不可能達成平等。但是也不能成爲藉口而爲了發展，坐視社會衝突的擴大。筆者認爲，不平等也許難以避免，但「政府坐視不平等的擴大」卻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宣稱社會主義的國家。競爭力的提昇，未必要犧牲平等。國家競爭力名列前茅的北歐諸國，其平等的狀況也是名列前茅。競爭力與社會公平應該存在魚與熊掌的得兼的關係。

有趣的是，執政者當前正不斷以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爲大西部開發背書。卻忽略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⁵，以養民爲前提，最後達成既均且富的社會。所施行的政策包括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以實業計劃進行開發、並輔以社會安全制度。整體意識型態與西北歐民主社會主義非常類似。這樣的制度體制，並非純然市場競爭，在西北歐運作多年，那裡也是全世界社會最祥和之處，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在中國實施⁶。如果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是可以同步發展，爲什麼只能選擇新自由主義市場之路做爲打擊失敗者的藉口？

至此，我們重申，大西部開發成功與否的癥結仍在爲政者之方向拿捏。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是各國政府致力追求的標的，依國際經驗，二者之間可能相輔相成，也可能彼此衝突、互相牽制。在中國政府爲平衡區域發展，強力介入大西部開發，並構築美麗遠景以安撫民怨、確保其政策正當性時，我們看到的卻是政府對社會議題的漠視與無力，並坐視權貴資本主義由東部直撲西部，並予以市場經濟之名坐大。目前大西部社會中的所得分配的惡化、階層發展與衝突、三農問題、族群衝突與族群發展、全球化的危機等面向在在挑戰決策者的能力與智慧，中共必須及早對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整合做出更好的方向抉擇。社會動蕩的危機並非經濟發展的必要之惡，然而我們卻眼看著它一再上演。

⁵ 見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

⁶ 台灣雖宣稱是三民主義的基地，但許多政策並未遵照中山先生原意。福利政策即爲明顯例子。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尹萍譯

1990,《2000 大趨勢》,臺北:天下文化。

王良能

2004,《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的機遇與挑戰》,台北:唐山。

田秋生

2002,《入世後的西部大開發》,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朱慶芳

2006,〈社會經濟和諧指標體系綜合評價和分析〉,載於汝信、陸學藝、李培林等主編《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宗勝利 李國忠

2006,〈2005年社會治安形勢〉,《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頁144—153。

孫治本譯(Ulrich Beck 著)

1999,《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

中國國家統計局

2002,《2001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3,《2002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4,《2003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5,《2004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6,《2005年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章榮君

2005,〈財政困境下的鄉鎮治理危機及制度選擇〉,《當代中國研究》,冬季號。

楊小凱

2000,〈後發優勢〉,《經濟學消息報》,北京。7月22日,版7。

鄭欣

2003,〈從‘團堡事件’剖析農民社會反抗頻發的根源〉,《當代中國研究》,春季號。

顧巖、楊宜勇

2006,〈2005~2006年:中國收入分配問題與展望〉,載於汝信、陸學藝、李培林等主編

2006,《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二、英文書目

Amin, Samir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an, Paul

1973/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Carnoy, Marti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What Planners Need to Know*. Pari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UNESCO.

Dos Santos, Theotonie.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231-236

Frank, Andre 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vans, Peter.

1997,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s?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No. 50, pp. 62-87.

Giddens, Ant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